

重溫學者志業

• 何懷宏

如果說今天人類正在進入新軸心時代，面臨新的文化創造的話，那麼，與此直接相關的是知識份子的社會功能問題。所以，在這個時候重溫一下學者志業，重思一下學者本分也許是適時的。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千年一遇的世紀，進入公元(耶穌)紀年的第三個千年。而在公元前的一千年裏，尤其是公元前800-200年之間，在世界上不同的幾個地區都不約而同地進入了雅斯貝斯(Karl Jaspers)所稱的「軸心時代」，各自獨立地奠定了自身文明和精神的基礎。與本文題目有關的是，在軸心時代的突破中，興起了一個新型的精神和知識階層，例如希臘的哲人、以色列的先知、印度的婆羅門、中國的士，正是他們成為新文化的創造者和某一種文化傳統的傳承者。如果說今天人類正在進入新軸心時代，面臨新的文化創造的話，那麼，與此直接相關的是知識份子的社會功能問題。所以，在這個時候重溫一下學者志業，重思一下學者本分也許是適時的^①，我想通過追溯近代以來有關學者志業的三篇講演來做這件事。

一 十八世紀的觀點： 理性人的代表

這三篇講演分屬三個世紀：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中和二十世紀初。

第一篇講演《論學者的使命》(*The Vocation of the Scholar*)是費希特(Johann G. Fichte)1794年在耶拿大學所做，費希特首先談了自在的人的使命和社會的人的使命^②。他認為，人作為有限的理性生物，其使命是無限完善。人固然永遠達不到完善的最終目標，卻可以無限地接近這一目標。同樣，人作為社會的成員，固然也達不到使所有社會成員都趨於完善和一致的最終目標，但也要不斷地力求使別人因你的工作而變得更完善，使所有社會成員不斷接近一致^③。

那麼，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階層的學者的使命究竟是甚麼呢？費希特認為，要保證人的全部天資得到同等的發展，首先就要有關於人的全部天資的知識，要有關於人的全部意向和需求的科學，要對人的整個本質有一個全面的估量。而為了這種知識，社會就應當有一個佔有這種知識的特殊階層。此外，還要有關於如何發展和滿足這種天資和需求的科學，因為那種需求的知識應當同時與手段的知識統一起來，只有憑藉這些手段，需求才能得以滿足。頭一種知識是根據純粹理性原則提出的，因而是哲學的；

第二種知識部分地是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因而是哲學—歷史的。另外，我們還必須知道我們所處的社會在一定的時代處於哪個特定的文化發展階段，這個社會從這一階段可以上升到哪個特定階段，社會為此應當使用哪種手段。為此，我們必須詢問經驗，必須用哲學眼光去研究過去時代的各種事件，必須把自己的目光轉到自己周圍發生的事情上，同時觀察自己的同時代人。因此，社會所需要的這第三部分知識就是純粹歷史的。上述三種知識結合起來就構成了我們所謂的學問，或者至少應當稱為某種專門的學問，誰獻身於獲得這些知識，誰就叫做學者。

並非每個人都應當在這三個方面掌握全部人類知識；這大多是不可能的，正因為不可能，如果非要這樣做，就會一事無成，就會浪費一個社會成員的一生，因此，各人可以為自己劃出上述方面的個別部分進行研究。由此，就產生了學者階層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視人類一般的實際發展進程，並經常促進這種發展進程。作為社會一個階層的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④，因為他是學者，所以他比任何一個階層都更能真正通過社會而存在，為社會而存在。

學者特別擔負着這樣一個職責：優先地、充分地發展他本身的社會才能、敏感性和傳授技能。另外，由於提高整個人類道德風尚是每一個人的最終目標，不僅是整個社會的最終目標，也是學者在社會中全部工作的最終目標。所以，從這最後一方面看，學者應當成為他的時代道德最好的人，他應當代表他的時代可能達到的道德發展的最高水平。費希特說，一個不辱使命的學者會具備這樣的思想^⑤：

我的本分就是把我這個時代和後代的教化工作擔當起來：從我的工作中產生出未來各代人的道路，產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這些民族將來還會變化。我的使命就是論證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運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響卻無限偉大。我是真理的獻身者；我為它服務；我必須為它承做一切，敢說敢作，忍受痛苦。要是我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視，要是我為真理而死於職守，我這樣做又有甚麼特別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應當做的嗎？

二 十九世紀：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第二篇講演《美國的學者》(*The American Scholar*) 是愛默森 (Ralph W.

費希特(圖)認為，學者特別擔負着這樣一個職責：優先地、充分地發展他本身的社會才能、敏感性和傳授技能。另外，提高整個人類道德風尚是每一個人的最終目標，不僅是整個社會的最終目標，也是學者在社會中全部工作的最終目標。



當新世紀來臨之際，中國的學者是否可以這樣提問：我們持續了一百多年的向西方學習的「學徒期」是不是也應當、甚或也可以結束了？是否有必要、也有可能有意識地開始擺脫或至少淡化「學徒情結」？也許，哪怕僅僅是有這樣一種意識、甚至只是有這樣一種期望就能帶來某些改變。

Emerson) 1897年8月31日在麻省劍橋美國大學生聯誼會上發表的^⑥。愛默森在演說的首尾都強調美國學者要開始擺脫歐洲的母體而斷乳，要謀求一個自身的發展，亦即美國在政治上獨立之後，還要努力謀求一種精神、思想和文化上的獨立。

愛默森在演講的開頭說，也許現在已經到時候了：美洲懶散的智力將要由它鐵一般沉重的眼皮下面望開去，滿足這世界對於它久未兌現的期望，取得比機械技巧方面的成就更好的東西。他說：「我們依賴別的民族的日子，對於其他國土的漫長的學徒期就要結束了。我們四周有千千萬萬的人向人生裏面衝進來，再不能用異邦殘剩的乾枯的穀糧來餵養他們了。」在結尾他又說到：「我們聽着歐洲溫雅的文藝女神說話，聽得太久了。人們已經懷疑美國的自由人的精神是膽怯的、模仿性的、馴服的。大眾與私人的貪欲，使我們呼吸的空氣變得厚重而肥膩，學者們總是一本正經、懶惰和柔順。」這種對精神文化獨立的要求，可以看作是這篇演講的主旨。

為此，愛默森認為美國學者必須致力於創造。然而，怎樣創造呢？以甚麼為依託，以甚麼為資源進行創造呢？那時的美國學者還談不上自己的學術傳統，或者說，這傳統就是歐洲。在這篇講演中，愛默森強調的是向自然學習，向既有的文化、書本學習以及在行動中學習三個方面。這其中，大自然對於精神上的影響，以時間來說是最先，以地方來說是最重要的。第二個要素則是人類的過去，是人類精神的歷史，而不論它是表現於文學、藝術還是典章制度，這方面最重要的當然是書籍。但是，書籍用得好的時候是最好的東西；濫用的時

候，卻可列入最壞的東西之列，故需謹慎地在吸收的同時又不讓它們約束自己的創造力。第三是行動，在一個學者的生活裏，行動是隸屬於思想之下，但也是必需的。他沒有行動，就還不能算是一個人；沒有行動，思想永遠不能成熟而化為真理。愛默森在這三個方面都強調要自我依靠、自己作主。

愛默森也把學者的工作與整體的人、與社會聯繫起來，他說：「你必須觀察整個的社會，才能夠得到整個的人。」人不是一個農民，或是教授，或是工程師，但他是一切。人是祭司、學者、政治家、生產者、軍人。在分裂的狀態中，也就是說在社會的狀態中，這些職務是分給了各個人，每人指望做那共同工作中派給他的一部分，各人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而在這職務的分配中，學者是被指定了代表理智的。也就是說，在正確的狀態裏，他是「思想着的人」。但在腐化的狀態裏，在他成為社會的犧牲品的時候，他就有成為別人思想的應聲蟲的危險。

愛默森這最後所說的更像是學者的一部分，是人文學者，而尤其是哲學家，在愛默森那裏甚至強烈地表現出一種對於那有望體現人的最高素質和潛能的天才和英雄的渴望——那是他和他的朋友卡萊爾(Thomas Carlyle)所共享的。而對於中國的學者，更耐人尋思的可能是這樣一個問題——當新世紀來臨之際，我們是否也可以對自己這樣提問：中國學者持續了一百多年的向西方學習的「學徒期」是不是也應當、甚或也可以結束了？中國學者是否有必要、也有可能有意識地開始擺脫或至少淡化自己的「學徒情結」？也許，哪怕僅僅是有這樣一種意識、甚至只是有這樣一種期望就能帶來某些改變。

三 二十世紀知識份子角色意識的變化

第三篇講演《以學術為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 是韋伯 (Max Weber) 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學子發表的，它不僅在時間上，即或是在情緒、學術理念上大概也離我們最近^⑦。在韋伯這裏，上兩個世紀的樂觀、昂揚的基調已經消失，韋伯甚至更希望年輕學子們多注意學術制度那枯燥、單調和嚴峻的一面，他這篇講演也更多地是為多數學者考慮，而不是激勵少數天才。

他提出，一個欲以學術為業者必須要有這樣的思想準備：許多平庸者完全可能越過他而先擔任教授。他能夠承受年復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輩爬到他頭上去，既不怨恨也無挫折感嗎？當然他可以回答說：「我只為我的天職而活着。」但在韋伯看來，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完全無動於衷地忍受這種事。此外，即便有極高造詣的學者，他的學術成就或許在10年、20年或50年後也會過時，會被後人超越。因為學術已步入了一個專業化、技術化的時代，世界已經歷了一個「脫魅」的過程，一切都可以計算，學科不再涉及終極關懷，與人生意義無關。所以，當我們談到對學術的內在志向的問題時必須看到，今天，這一內在志向同作為職業的科學組織相反，首先便受着一個事實的制約，即學術已達到了空前專業化的階段，而且這種局面會一直繼續下去。無論就表面還是本質而言，個人只有通過最徹底的專業化，才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嚴格的專業化能使學者在某一時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時刻，相信自己

取得了一項真正能夠傳之久遠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確而有價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項專業成就。

於是，韋伯對學術在人生、信仰、終極關切方面的意義和學者的使命，就不可能再像費希特、愛默森那樣充滿一種昂揚和自信的情緒了。他問到：學術對現實的和個人的「生命」能有甚麼積極的作用嗎？首先，當然有一些技術知識，利用這些知識的計算，可以對生活，包括外在的事物和人的行為進行控制。其次，還有些思維方法，以及這種方法所必須的手段和訓練可以提供幫助，從而使人們達到第三個目標：頭腦的清明。這樣至少能協助一個人說明自己行為的終極意義。但是，總的來說，今天的科學，不再是派發神聖價值和啟示的「職業」了，而是通過專業化學科的操作，服務於有關自我和事實間關係的知識思考。它也不屬於智者和哲人對世界意義所做沉思的一部分。對於在正競爭互鬥的價值和意識形態諸神，我們究竟該侍奉哪一位的問題，你只能說，讓一位先知或聖徒來回答吧。可是，也許我們注定要生活在一個既沒有神，也沒有先知的時代。

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也就是現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迹，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走進了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今天，唯有在最小的團體中，在個人之間，才有着一些同先知的聖靈相感通的東西在極微弱地搏動。而在過去，這樣的東西曾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的共同體，將他們凝聚在一起。如果今天有人希

對於在正競爭互鬥的價值和意識形態諸神，我們究竟該侍奉哪一位的問題，你只能說，讓一位先知或聖徒來回答吧。可是，也許我們注定要生活在一個既沒有神，也沒有先知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命運是，那些終極的、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迹。

望宣揚並沒有真正先知的宗教，則會出現一種靈魂的怪物。學術界的「先知」所能創造的，只會是狂熱的宗派，而絕對不會是真正的共同體。

當然，我們有必要指出，韋伯並不是在歡呼學術的這一趨勢，他只是冷靜地指出這一趨勢，並指出其不可避免，他內心深處對這一趨勢的態度是複雜的，甚至是不無感傷的，但他還是堅持只能這樣做。人必須清楚在某些他不可改變的既定條件下能夠做甚麼，不能夠做甚麼，並努力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得最好。

四 新的超越突破有沒有可能？

綜上所述，我們也許可以說，費希特、愛默森、韋伯分別強調了作為一個學者的社會承擔^⑥、民族承擔和專業承擔。而韋伯對學者專業承擔的強調，最清楚地勾畫出了現代學術的基本特點：學術就是一件「平常事」。但是，公元前那一次「軸心時代」的突破顯然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知識的量的突破。雖然隨着精神所開闢的新的視角和領域，也伴隨有知識量的急劇擴張，但它主要或首先是一種精神的突破、一種超越的突破，或者說哲學、宗教的突破。而今天的學者在一般情況下僅僅是一個專家，一個較多地掌握某一門知識的所有者。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是否還可以說「突破」？或者這種「突破」就表現為知識在量上的飛速增加、大量累積和便捷傳播？

當然，問題還更深地涉及到：當近代以來世界趨於一體，人類是否真有可能或已經在進入一個新的軸心時代？雅斯貝斯表達過這樣一種看法：

「我們這個科學與技術的時代是一種二次開端」，艾森斯塔特 (Shmuel N. Eisenstadt) 更明確地說到「第二個軸心時代」，但同時認為這一新時代也包含着自身毀滅的種籽。

現代學術的專業化及其在數量和範圍上的巨大擴展固然令人欣喜，這方面的成就亦可視為一種可驕傲於古人的長足進步，問題是如果「軸心突破」主要或首先是一種精神的突破，是創造或更新思想的基本範疇和精神的 basic 信仰，而現代人那種如「聖靈」般的創造精神卻可能正像韋伯所說，不得不蟄伏於極少數人的心底而與學術無涉。那麼，現在的學者對此能做何種貢獻？或者「突破」本就與學者無關，突破者(如果有)將來自於學界之外？而未來將興起的、承擔突破的社會階層(如果有)，也會是一個相當不同於現代學者的階層？但這些顯然已超出我們在此所能探討的範圍了。

也許我們完全不必太多地去考慮新的「軸心時代」、「突破」或者「復興」的問題，我們只需努力把自己目前的專業工作做得盡量好，而並不去想這種工作在後人所見的「歷史」中將具有何種意義——那是他們的事，不是我們的事。但是，另一種考慮又使我們不敢完全熄滅那可能也在自己心底深處微弱跳動的火燄，有沒有這種火燄也許將使我們的學術工作大不一樣：如果完全沒有這種火燄，我們也許就會將某些本可突破的界限視作不可逾越的藩籬；如果完全沒有這種火燄，我們也許就會在時機趨於成熟時失去一次新的超越機會。

而且，我們今天面臨的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人類世界已結為一體，這是和公元前「軸心時代」那些曾經分別致力於自己的創造的古人們很不同的一

我們今天面臨的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人類世界已結為一體，這是和公元前「軸心時代」那些曾經分別致力於自己的創造的古人們很不同的一種處境。這也許意味着今後人類文明的興衰不可能再有此伏彼起，而是必須存亡與共、生死與共。

種處境。這也許意味着今後人類文明的興衰不可能再有此伏彼起，而是必須存亡與共、生死與共。而另一方面，人類所面對的新的問題和挑戰卻日趨嚴重和迫切，僅僅依賴知識和技術似乎並不能解決那些根本的問題。人類數千年前才以加速度開始了自己的文明行程，留給人類的時間和機會可能也並不很多。在世界物質的繁榮和人類物欲的巨漲之後是否隱伏了某種重大的危機？這種危機的克服是否有賴於某種精神的突破？而如果說「世界精神已近午夜」，我們是否還能再看到一次人類精神那「偉大的破曉」呢？那僅在很少數人的心底裏「極微弱地搏動」的火燄，是否還有可能再一次「像燎原烈火一般，燃遍巨大共同體，將他們凝聚在一起」呢？

註釋

① 在此我寧願用「學者」一詞而不用「知識份子」的概念，以不僅與中國傳統的稱謂聯繫起來，也稍稍淡化後者在今天容易引起爭議乃至激動、焦灼不安的成分，使之更顯平常也相對較易區分。學者當然可以不僅包括以學術為業者，也包括業外的「有志於學」者，但主要還是指大學和研究機構裏的學者。

② 以下參見費希特(Johann G. Fichte)著，梁志學、沈真譯：《論學者的使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③ 當時德國的啟蒙者分享着類似的觀念，例如，我們可參看年輕的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1792年春天開始撰寫的《論國家作用範圍的界限》(*Ideen zu einem Versuch 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s zu bestimmen*)一書中對人的目的的論述：「人的真正目的——

不是變換無定的喜好，而是永恆不變的理智為他規定的目的——是把他的力量最充分地和最均勻地培養為一個整體。」見林榮遠等譯：《論國家的作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30。

④ 注意不是「國家」，費希特甚至預定期國家終將消亡。

⑤ 同註②，頁41。費希特所強調的對學者作為道德表率的要求在當代已絕少被質詢、甚至被提及了，一個例外也許是約翰遜(Paul Johnson)1988年出版的《知識份子》(*Intellectuals*)一書(中譯本，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儘管作者對有的批評對象可能並不完全公允，我還是認為該書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當世俗知識份子(該書主要是指近代以來風頭最健的鼓動型知識份子)取代教士而想做社會的領路人(或良知、正義的代表者)時，他們自己的品行如何？尤其是他們對具體的人，對他們的親人、朋友怎樣？與費希特稍有不同的，約翰遜所涉及的也許還不是道德的表率而只是道德的底線，是想問這些知識份子在基本的道德規範面前是不是可以例外，因為他們也曾經這樣從道德上非難過他們的教士「前任」。

⑥ 下面的引述見“The American Scholar”，in *The Best of Ralph Waldo Emerson, Essay, Poems and Addresses* (New York: Walter J. Black, 1941)，中譯文參考手頭的張愛玲(北京：三聯書店，1986)、博凡(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兩個譯本(坊間還有趙一凡的譯本)。

⑦ 以下的引述見韋伯(Max Weber)著，馮克利譯：《學術與政治》(北京：三聯書店，1998)。

⑧ 或人類承擔，或更準確地說：作為人類社會一個階層的特殊承擔。